

老

上海文化生活丛书

老上海文化奇葩

孟令兵 著

——上海佛学书局

LAOSHANGHAI WENHUA QIPA
SHANGHAI FOXUE SHUJU

上海人民出版社

老上海文化生活丛书

孟令兵 著

老上海文化奇葩

——上海佛学书局

LAOSHANGHAI WENHUA QIPPA
SHANGHAI FOXUE SHUJU

上海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老上海文化奇葩:上海佛学书局/孟令兵著.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

(老上海文化生活丛书)

ISBN 7-208-04224-1

I. 老... II. 孟... III. 上海佛学书局—概况

IV. B947.25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86068 号

责任编辑 苏贻鸣

封面设计 柯国富

美术编辑 王晓阳

·老上海文化生活丛书·

老上海文化奇葩:上海佛学书局

孟令兵 著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c)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经销

商务印书馆上海印刷股份有限公司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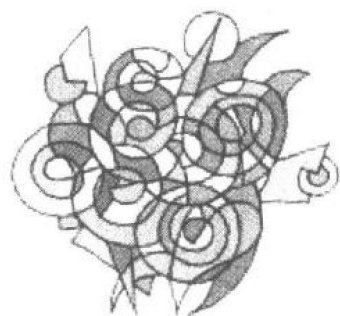
开本 850×1092 1/32 印张 6.25 插页 4 字数 120,000

2003 年 1 月第 1 版 2003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5,100

ISBN 7-208-04224-1/K·964

定价 13.40 元



目 录

- 一、时节因缘此际会——上
海佛学书局创立的背景/1
 - 1. 颓波日下可能回?:传统佛教的衰落与近代佛教的复兴/1
 - 2. 十里洋场,好作道场:上海——近代中国佛教复兴之中心/14
- 二、应机弘法开生面——佛学书局的主
营业绩/22
 - 1. 天时、地利、人和、制度优势——上海佛学书局的成立/22
 - 2. 寓弘化于营业之中,播善业于四海之内:经营策略及其成绩/36
 - 3. 广播法音,最为第一:《佛学半月刊》/59
- 三、诸所施为皆佛事——其他十项事业
成就/71
 - 1. 广设分局及分销处/71
 - 2. 设立造像所/75
 - 3. 附设佛学文会/78

4. 首倡无线电广播佛化节目/83
5. 灌制佛化唱片/85
6. 创立佛学研究函授社/86
7. 创办佛学书局图书馆/87
8. 建立刻经部/89
9. 出版和代办发行佛学刊物/92
10. 经营法器文物/96

四、法门无量誓愿传——近代《大藏经》及佛典要集的刊行/99

1. 正法难闻,中国难生:汉文《大藏经》简介/99
2. 胜缘聚合,斯为增上:佛学书局与近代汉文《大藏经》的刊行/106
3. 华藏海会,乘愿再来:《华严经疏钞》等近代佛典要集的整理与刊行/123

五、唯是一心挽劫波——佛学书局出版、发行、流通的佛学通籍/136

1. 天下佛书,尽在此矣:佛学书局出版与发行的佛学图书分类/136
2. 文字方便结法缘:佛学通籍部分的重要著作/143

后 记/190

一、时节因缘此际会

——上海佛学书局创立的背景

1. 颓波日下可能回?: 传统佛教的 衰落与近代佛教的复兴

“法不孤起，仗缘乃生。”上海佛学书局的创立及其所带动的近代佛教出版业的长足发展，正应验了佛家这一不易的真理。上海佛学书局诞生之日正是中国近代佛教复兴运动走向高潮之时，时节因缘促使佛学书局乘势而起，迅速发展，从而又进一步推动了近代中国佛教的全面复兴。上海佛学书局这一以编辑、刻印、流通佛学书籍为主营业务的实业综合体，以出世精神做入世的事业，善巧利用近代科技和工商体制等为方便施設，即尘劳而为佛事，转世俗而为道场，虽不以营利为目的而能成办弘扬佛法、利乐有情、觉悟众生的超越宗旨，终使弘法事业蒸蒸日上、蓬勃发展，成就了近代佛教史上一桩伟大的事业。

上海佛学书局是在近代中国佛教复兴运动这一时代大背景下创立并发展的，所以有必要简介一下中国佛教

的兴衰史,尤其是近代中国佛教复兴的情况。

佛教自两汉之际开始从印度传入中国,此后历经三国两晋南北朝的不断接纳、吸收、融合和再创造,至隋唐而臻于全盛。当时中华大地上,梵刹林立,高僧辈出,八宗竞秀,新说迭出。不仅将印度大乘佛学中所蕴含的深奥玄妙的哲理,淋漓尽致地畅演发挥以至于圆极,达到了中国佛学、乃至中国古代哲学思想的辉煌的顶峰,还结合本土国情创造出更具华夏色彩的宗派教理(如禅、净二宗)、修行方式、教团组织、清规戒律、仪轨制度等等。同时佛教以其强盛的生命力,不断地向中国世俗社会和文化的更深、更广的领域渗透、融会,刺激和促成了中国本土文化走向更高层次的品位与审美境界,大大丰富了国人的精神世界,终于产生了具有悠久历史和巨大魅力的中国佛教文化,成为中华传统文化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的有机组成部分。综之,佛教作为中国学术思想的一大主流,其领导文化,贡献哲学思想,维系世道与人心,辅佐政教之不足,可谓厥功甚伟。

然而,自唐末以降,以唐武宗灭佛为标志,中国佛教日趋保守、衰落,渐渐失去了它昔日的勃勃生机。这种症候显见于南宋末,加速恶化于明代后期,至于清末,已是衰朽不堪,病入膏肓,到了生死存亡的关键之时。面对其江河日下、万牛莫挽的颓势,时人徒唤奈何。举例而言,作为住持佛法的主体,当时的僧尼文化水平之低,远远出乎人们的想象,印光法师就曾说过,僧侣中不识字者要占80%以上,实际还不止于此。以全国有名的大寺镇江金山寺为例,当年,与太虚等“大闹金山寺”的释仁山就曾当

众赌誓说：“金山寺内的寺众（时金山寺常住众三四百人），倘有人能写三百个字通达的书信，我仁山愿把头剃下来！”，这番措辞，尽管有失偏激，但应非风影虚词，无根空言。当时的僧众大多为无文化、无信仰的流民和贫困破落者，其寄身佛门，只为衣食有着，聊以卒岁耳。在清末的一本记述京华风物的书上，竟把僧尼道士女冠与蚤虱蚊蝇等并列为人间“十害”，当时整个社会对僧道普遍的反感程度，于兹可窥一斑了。所谓穷则思变，对此佛教界内外的有识之士都有着清醒的认识并作了揭露抨击，如近代佛教改革领袖太虚大师总结此末流之陋习的种种表现，批判中国传统佛教的消极面，提出教理、教产、教制三大革命纲领，大声疾呼对传统佛教进行全面的改革，于艰难困顿中领导了近代中国佛教复兴运动。佛学大师欧阳竟无则以居士的身份严厉斥责僧尼的游惰坐食，“诚国家一大蠹虫”，极力主张沙汰整顿，认为国家“应于百万众中精细严察”，至多不过取数百人，“以为专作住持大教之用”，余则迫令还俗。其语虽激切，但亦多分属实。苏曼殊、章太炎也在《敬告十方佛弟子启》中沉痛揭露当时僧界的种种弊病，呼吁僧俗速起自救。然而恰恰是这位所谓的曼殊大师本身，就大不守戒，常着僧服而饮酒食肉，甚至混迹于脂粉场中，放浪形骸，沉湎情欲，风流倜傥，亦僧亦俗，写下过诸如“还卿一钵无情泪，恨不相逢未剃时”、“袈裟点点疑樱瓣，半是脂痕半泪痕”这样香艳哀婉、空不离“色”的本事诗。

中国传统佛教的衰落有其深刻而复杂的原因，首先，就佛教自身的教义教理而言，其典籍浩繁，义理深奥，修

证纂难，偏重于出世，令其难以契合广大众生的日用平常心理和精神需求，无法真正扎根于现实社会中，这在佛教的发源地古代印度如此，在中国更是如此。其次，就中国佛教来说，以公认的最具中国色彩的佛教两大宗派——禅宗与净土宗以及仪轨制度——丛林制度为例，禅宗在唐末获得了高度发展后，便以风行草靡之势横扫佛教思想界，出现了唯此一宗独盛的局面。因此宗主张教外别传、不立文字，遂至“废经不观”，从而导致义学研究人才锐减，直接影响了天台、华严、唯识诸宗的过早衰落，乃至典籍散佚，乏人问津。到了晚明，禅宗更是弊端丛生，毁斋破戒，出现了狂禅的问题。而净土宗虽也大行于社会各阶层，往往多仅持六字洪名，重实修而轻“闻、思”二慧，同样缺乏对佛家义理的兴趣。这样，就使得中国佛学在义理学习、研究、创新等方面都过早萎顿衰歇，固步自封，失却了佛法教、理、行、果之间应有的内在平衡，中国佛教的整体衰微走势自在预料之中了。至于中国佛教丛林制度的创立，本来是为安定僧众修道，在中国佛教史上，此项佛家的制度创新的确曾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但也因此而令传统佛教在经济上主要依赖地产维持，这些数量相当可观的山林寺田等，到后来越来越成为修道的累赘。受中国传统文化强大的负面作用的影响，尤其是世俗社会的传统宗法制度的侵蚀，印度佛教内部原始朴素的民主作风丧失殆尽，严格的戒律也置若罔闻，一般的寺僧或对外勾结，盗卖寺产，争取获利，或内部勾心斗角而酿成“房头之患”，而世俗社会各阶层对寺产也垂涎觊觎之，如劣豪流民之奸取，官府衙门之盘剥。近代绵延不绝的“庙

产兴学”风潮实亦缘由于此。而另一方面,正由于寺院具有可以养活众多人口的经济实力,因此也成为走投无路的破产农民的一种生活出路与选择,而他们往往文化水平甚低,根本就谈不上对佛法的正信。这就是历代佛教史上一直都存在的僧尼过多过滥、羸劣不堪的一个重要原因。此外,导致传统佛教衰落的另一重要因素就是朝廷宗教政策的失误,如明朝的后期,将僧尼戒坛严禁,不许说法,管制游方,以纳银代替考试度僧等。而清朝从乾隆十九年始废除了历代由官府控制的通过考试剃度出家人的制度,朝廷停止发放度牒,僧尼只有戒牒而无度牒,寺院传戒也就漫无限制了,这些举措都导致出家泛滥,僧品拣别无由。而且由于度牒制度被废除,朝廷的僧官制度也就无形中废弛,使各地僧团之间的官方联系自行中断,寺院之间就形同一盘散沙,分宗立派,各不相谋,各自为政。造成近代佛教极度衰微的另一重要而直接的原因,是太平天国战火对江南地区佛教文物的严重破坏,这使本已衰迈不堪的中国佛教几遭灭顶之灾,到了存亡续绝的境地。太平天国自1851年起事到1864年覆灭的14年内,先后曾据有以江南地区为主的18个省,几殆天下三分之二,其兵锋所及、政令所至之处,凡属所谓异教,一概排斥。无论佛寺道观、民间祠庙或神像经卷,尽皆摧灭无遗。经此浩劫,原来素以佛教兴盛而著称的江、浙等地,连极为常见的佛教典籍也难以寻觅。这也正是人称近代中国佛教复兴之父——杨文会会同同道创办刻经处的直接动因,近代佛教复兴运动由此肇始。

中国佛教不断衰落的深层次的原因还要从佛教文化

与中国传统文化，尤其与民族文化心理结构的矛盾与差异方面去找。佛教在中国历史上一直未能成为主流文化，难以融入国民心性中的深层原因，恐怕还在于以儒家文化为代表的、中华民族久已成型的文化心理结构。李泽厚先生把中国的民族性格和文化心理结构归结为血缘根基、实用理性、乐感文化、天人合一这样几点。大致说来，无一与宗教性存在相契点，不仅无缘，甚至恰恰相反。而近代著名哲学家熊十力则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国民族之特性，即无宗教思想”^①。

物极必反，否极泰来，中国佛教盛极而衰，乃复由衰极转盛，此亦自然循环之理。近代佛教得益于诸多因缘的辐辏聚合，遂勃然而兴。首先是近代中国遇到了二千年来从未有之大变局，遭受了前所未有的剧烈冲击。国门被迫打开后，使人们在倍感屈辱的同时，也看到了外面无比新鲜和精彩的世界。在逐渐了解、接受汹涌而入的西方思想文化的过程中，审视反思吾国积贫积弱的现实和死气沉沉的传统，一直禁锢中国人思想、也历来压制佛教的儒家文化专制局面终于开始受到质疑、动摇并最终解体，乃至被激愤地打翻在地。在这种情况下，素有民族自豪感的国人在艳羨西方文明发达的同时，强烈自尊心又促使他们在传统文化中寻找自己既可以安身立命，复可拯世济民，又堪与西方文化思想相抗衡的资源。于是乎，佛教，人们重新发现它不惟以慈悲为怀，主张众生

^① 熊十力致意大利米兰大学罗雪亚诺·马格里尼的长函，时间约在1936年春至1937年冬。

平等而甚少封建意识,同时又体系严密,哲理深湛,教义圆融,岂止与西方学术思想相媲美!自然备受有识之士的青睐,不约而同地油然兴起研习佛法之风气。晚清的变法维新派和后来的革命派都从佛学中寻求救国救民的思想,如康有为、谭嗣同、梁启超、章太炎、杨度等,对当时的思想界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同时,近代中国社会兵连祸结,可谓劫难重重:外强欺侮,内战频仍,加之天灾不断,近代中国所忍受的无以复加的痛苦,活脱脱就是人间地狱,也为佛教的全面复兴准备了社会土壤。苦海无边,人们厌离苦难,祈求解脱的愿望愈加猛烈。于是,众多仁人志士们欢喜信奉佛法的同时,自利利他,拯世济民,热心弘扬佛法,为沉沦苦海中的同胞提供急需的宗教慰藉。

近代佛教复兴运动还得益于一大逆缘,佛家称之为“逆增上缘”,那就是近代不断掀起的“庙产兴学”风潮。所谓“庙产兴学”,是指寺庙的一切财产,皆可以用来办学校,教育百姓。始作俑者就是当时的湖广总督张之洞,他1898年上奏《劝学篇》,其中有建议将天下寺观十分之七改建学堂(这主要针对佛教而言,因当时道观占寺院总数二十分之一还不足),由此触发近代绵延久之的“庙产兴学”风潮。该建议被光绪帝采纳,全国各地迅即行动,维新变法失败后被禁止。但此类作法从未因此止息,在此后的北京政府、南京政府期间不时效尤而兴风作浪。庙产兴学风潮虽给佛教寺产带来很大损失和诸多困扰,比如仅上海地区,据不完全统计,当时佛道寺观被改建学校的就有53所,而著名高僧八指头陀还为之殉法以抗争。但此风潮也给佛教界以强烈的震撼,令其产生严重的危

机感与自觉自救的意识，识时务知大体的清醒者主动迎接挑战，昧于大势因循守旧者也不能不被迫做出反应。于是各省、县纷纷成立僧教育会，以佛教寺产兴办佛教教育，创办许多僧教育机构，包括后来的众多的佛学院。它们多为新式教育，一改过去师徒递相传授的旧传统，仿效一般学校，实行上课制，在传统经论的基础上，多以现代教育教学方式辅以新学思想，培养了大量的弘法人才，他们承继传统的同时视野开阔，心量广大，成为具有现代意识的僧侣，积极推进近代中国佛教的改革与复兴运动。值此大难当头的危机时刻，也使佛教界形同散沙局面为之改观，大家迅速达成共识，为维护教界自身的权益，必须团结一致，建立统一的全国性佛教组织，于是有中华佛教总会、中国佛教会等一系列全国性的统一的近代民间佛教组织创立。

近代佛教复兴运动的首功应归于信仰虔诚的居士学者们。因为当时的出家僧众绝大多数都故步自封，抱残守缺，不仅对传统佛教岌岌可危的现状认识不足，缺乏危机感，对世界大势和新学思想更是充耳不闻，了解无多。而作为知识分子的学者居士们，视界开阔，认识清醒，能够积极顺应时代潮流的转变。他们都或多或少地接触过新学，许多还曾出国考察或留学过（大多为日本）。其发轫者，当推清末杨文会（仁山）居士，他于1866年创立近代最著名的金陵刻经处，刻印藏经，开佛教复兴运动之端绪。1907年又开设“祇洹精舍”培育僧俗弘法人才，1910年创立“佛学研究会”，为现代佛教院校、团体建立的嚆矢。紧随之而涌现起了璨若群星般的高僧大德、居士学者，大批各种各样的佛教组织也犹如雨后春笋般建立起

来,其蔚然兴起之势,真令人瞠乎其后!近代中国佛教界出现了如虚云、谛闲、印光、敬安、弘一、太虚、圆瑛、能海、法尊、月霞、应慈、兴慈、倓虚等德行卓伟、摄化无方的高僧,其影响不让唐宋古德尊宿,至若在家居士,如杨仁山、欧阳竟无、韩德清(清净)、夏曾佑、吕澂、王恩洋、夏莲居、徐蔚如、高鹤年、刘洙源、梅光羲、江味农、蒋维乔、范古农、朱子桥、王季同、史一如、江谦、丁福保、周叔迦、黄涵之、简照南、王一亭、高观如、叶恭绰、陈铭枢等,他们多为工商界、学界或军政界之名流,解行相应,悲智双运,积极践行大乘佛教利乐有情,净化社会的菩萨精神。

当时,遍及全国城乡的缁素佛教组织团体,种类繁多,宗旨不出弘法利生,拯济世道人心。其中有全国性的佛教组织,如中华佛教总会、中国佛教会等。有众多的规模不等的居士修行与弘法的团体:居士林、功德林、净业社、莲社等。有佛学教学研究团体、教育机构,如由高僧大德或寺院开办的佛学院之类,著名者:支那内学院、武昌佛学院、闽南佛学院、汉藏教理院、中国佛学院、华严大学、观宗学社,更有各种期限长短不一的讲经会、研究会、法会等。还有许多服务社会、救苦救难的慈善、救济团体,不论是水旱天灾还是战争人祸,都有他们的身影出现,如康寄遥在陕西发起组织的华洋义赈济会,上海成立的苏北灾区救济伤亡委员会,以及抗战期间成立的上海僧侣救护队、陪都僧伽救护队、上海慈联救济战区难民委员会等。

出版社、报社、电台等以近代科技手段弘扬佛法的组织机构也纷纷问世,尤以上海得风气之先,他们出版了大量的佛教经籍和普及性读物,引导无量众生生发正信,步

入佛门。近代许多佛教善书的发行量或销售量都在十几万乃至几十数百万册。近代发行的佛教刊物报纸,据日本研究中国近代佛教的学者统计,从1912年至1936年,包括年刊、季刊、月刊、半月刊、旬刊、周刊、周报、日报各种形式,大小佛教报刊有300余种,著名的如《海潮音》、《内学年刊》、《弘化月刊》、《微妙声》、《威音》、《人海灯》、《佛学半月刊》,其中最富学术价值的《内学年刊》,坚持时间最长、影响最为深远的《海潮音》,影响面最广、发行量最大的《佛学半月刊》,国内唯一的佛教日报如上海创刊的《佛教日报》等等。而以电台播经弘法不受地域、天气限制,更是出人意表的善巧弘法方式。

近代佛教的复兴更体现在宗派、义理的全面复兴。传统诸宗,在近代都获得继承发扬,重振宗风。如虚云、来果等重振禅宗,虚云不仅兴复禅宗祖庭丛林十余处,而且接续久已绝嗣的云门、沩仰、法眼三宗,令“一花五叶”再现于世,作为近代最著名的禅门宗匠、不世出的法门龙象,他一生充满传奇,120岁高龄始圆寂。印光、夏莲居等力弘净土,影响甚大,印光大师被尊为净土宗第十三祖;弘一、慈舟等重兴南山律宗,弘一以其跌宕起伏而多姿多彩的传奇人生向世人现身说法,昭示由艺术升华而为宗教的信仰之旅,被尊为南山律宗第十一祖;月霞、兴慈等重兴华严宗,创办华严大学、法界学院等培育僧才;创办观宗学社的谛闲、弘化东北的倓虚、大学生而出家并与广东、香港特有法缘的宝静等,重兴天台宗;欧阳竟无、韩清净等重兴法相唯识宗,创办支那内学院、三时学会,讲学研究,令千载绝学重光于世。一时起衰振敝,继往开

来，诸宗竞秀，大有直追盛唐佛教之势。

在这样一个风急雨骤、革故鼎新的时代，人们不会仅仅满足于祖述古德，步武宗风的。法师、居士们远赴重瀛，或东渡日本，如大勇、持松、显荫、王弘愿、顾净缘等，取回久已绝传的唐密；或赴印度、锡兰、缅甸、泰国诸国学习、译介南传佛教等，如法舫、白慧、了参、黄茂林等。藏传佛教，自古而来由于受汉族的传统伦理观念等的限制而不得发展，在近代则得以大行于内地，包括藏传佛教的格鲁派（俗称黄教）、宁玛派的许多高僧都在内地，尤其在上海建立各自的道场，至于藏传佛教领袖九世班禅大师弘法内地，两次驻锡沪上，更是轰动当时。而内地的法师居士如大勇、能海、法尊、密悟、张澄基、陈健民、刘立千、南怀瑾等赴康藏学法，大大丰富了中国汉传佛教的内容，尤其是在唯识宗与密宗方面。此外近代的吕澂、黄树因、苏曼殊、林藜光、韩镜清、郭元兴等皆通梵文或藏文或两者兼通，为沟通中外、汉藏佛学皆全力以赴。至于精通日文者更是不胜枚举，他们大量翻译、借鉴日本佛教的研究成果，大大促进了近代中国佛学研究的兴盛发达。学习素来不为重视、被中国视作小乘佛教的南传佛教，是为了探究佛教的本来面目，所以，很自然地，人们就会沿波讨源，回溯寻求大小乘佛教之原生态，所谓探源而正流，以重辉纯正的佛法。于是就有欧阳竟无、韩清净等近代居士大德，宗尚印度法相唯识学，以之为纯为正，而对中国传统佛教颇有微词。台湾印顺法师等更探本于原始佛教，尤宗般若学。

除去从上述各宗派教理、教义方面表现出的传统佛教对新时代所做出的回应而外，传统佛教欲顺应世界潮

流、适合现代社会,应机而重振,就必须实行全面的制度性变革。时势造英雄,天降大任于斯人,乃有太虚大师应世而现,以其远见卓识,深刻剖析和批判中国传统佛教的消极面与现存的诸多弊端,契理契机地提出“三佛革命”的口号,呼吁对教理、教制、教产进行全面的改革,以求适应新时代,为传统佛教注入新的生机。他提出的“人间佛教”或“人生佛教”的构想,力求将传统的畸重出世、死人的佛教,转化而为注重现世人生、发达人生、利益人生的人生佛教。他的革新思想连同其一整套的改革方案,虽在当时未获普遍的认同和实现,但其此后的影响正与日俱增,当今的海峡两岸的佛教,基本上都是沿太虚开辟的“人间佛教”的道路在发展。

近代佛教复兴的影响还可见诸于与西方宗教、哲学、科学的沟通与对话。许多法师、居士都在这方面作出了自己的贡献。太虚大师运用西学诠释佛法,并以佛教的观点评价批判西学,如他著有《佛法与科学》、《唯物科学与唯识宗学》、《佛学的“色法”与“物”》、《论天演宗》等。上海佛学书局编辑出版的《海潮音文库》中之科学、哲学、宗教、进化论、社会学、政治学等诸册,多属此类的尝试。王季同、尤智表等以科学家的身份论证佛法,王季同著《佛教与科学》、《佛法省要》、《佛法与科学的比较研究》、《一桩轮回确证讨论集》,尤智表著有《一个科学者研究佛经的报告》(该书后由李荣熙译为英文),杨棣棠《佛法万能中之科学化》。还有如张纯一著《佛化基督教》等著作问世,作出了欲以佛法融摄基督教的尝试,而当时确有一些基督徒改宗佛教者,著名的如聂云台、穆藕初、曹伯权、玉慧观等。